

星期天夜光杯

余子道 九旬学者 与他的《上海抗日战争史》

◆ 读史老张



■ 余子道近影

由余子道等主编的《上海抗日战争史》三卷本,150万字,将于今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期间出版。九旬学者主编《上海抗日战争史》,这是一个奇迹!

余子道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。他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、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等研究领域,独树一帜,屡出成果。这位出生于1931年的复旦名师,虽已到了鲐背之年,但他德高寿遐、思维敏捷,至今笔耕不辍,一直活跃在学术一线。

大概是1983年秋吧,余老师开设“中国近现代军事史”课程。我没记错的话,这是改革开放后他开的第一门课,地点是在第二教学楼底楼一个朝南教室。我当时已是社部部中共党史教研组的助教,连忙跑去旁听,终于见识到了余老师的风采。

余老师身材中等、衣着朴素。那时天气还热,记得他穿着短袖白衬衫,蹬一双凉鞋就走上了讲台——关于这双凉鞋,后面还有故事:有一次,余老师去市高院查找汪伪政权历史档案,市高院领导听说复旦来了大教授,忙去迎接。那天,天下大雨,余老师打着伞、蹬着凉鞋出现在门口,领导们怎么也不敢相信,眼前这位中年人,就是大名鼎鼎的“余教授”。

余老师上课,讲话声音响,中气十足。我是“旁听生”,即便坐在那个狭长教室的最后一排,仍有耳膜微震之感。不过,他的余姚口音很重,有几个关键词,一定要仔细联系前言后语,才能听明白……有关余老师的口音,也有一段趣闻。1999年1月,中日战争军事史国际研讨会在日本庆应大学举行。出席会议的,有日本学者,也有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,余老师和金冲及老师等与会。日方很客气,特别请来一位留学生当翻译。会上,余老师照例用他的余姚普通话侃侃而谈,那位翻译却怎么也听不懂,一时场面尴尬。这时,金冲及老师挺身而出,他将余老师的话译成普通话,再由翻译将它译成日语……这个画面,充满谐谑气氛,至今仍是有趣的学者笑谈。

旁听了一学期“中国近现代军事史”,我逃过几次课——有时是因为工作忙,有时是因为余老师的口音。所以,我没有像余老师的研究生金光耀、王建朗等同学那样,听得那么仔细、那么认真。后来,光耀们都成了名教授,而我呢,不仅“逃”了余老师的课,还“逃”出了复旦,外出漂荡……如今想来,懊悔不已!

余老师自己一向为人低调,很少张扬。我1978年考进历史系时,因为余老师没给我们开过课,也没参加我们的毕业合影,我根本不知道系里有一位叫“余子道”的老师。

我知道“余子道”这个名字,是1982年毕业留校以后。当年,我被分配到社部(今马克思主义学院)任教。9月一开学,社部领导就命我赴西安西北大学,参加为期三个月的“中国现代史讲习班”。这个讲习班,由来自北京的众多现代史研究名家讲课,如彭明(五四运动史)、张同新(国民党新军阀史)、杨云若(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史)和蔡德金(汪伪政权史)等教授,可谓群贤毕至,规格很高。

与我同去西大讲习班学习的,是历史系总支副书记刘其奎老师,他跟我住同一宿舍。一天,刘老师约我去西大招待所,拜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先生。彭先生亲切和蔼,说话声音醇厚。他向刘老师——打听复旦历史系情况,提到了一个名字:“余子道”,说他当年在人大进修过……就是在那一天,我才知道,历史系里有位余老师。回宿舍后,刘老师跟我说:“在历史系,老余资格老、威望高,人人都喜欢他。”我当时就想,这个余老师,是怎样一个人呢?

不久,历史系就传来一个重磅消息:因任期届满,谭其骧先生不再担任历史系主任,系里决定民主选举系主任。经投票表决结果,余老师当选为新一届的历史系主任!当年在复旦,“民主选举”是新鲜事,我对投票结果特别敏感。后来,公开的信息表明,那次选举,实际参加的人数为102人,发出选票102张,收回选票102张(其中三张废票)。“余子道同志以99票当选系主任”。也就是说,余老师几乎得了全票!

这次选举结果,让我真正领悟了刘老师所称“老余资格老、威望高”的含义。据说,远在北京的金冲及老师得知后,给余老师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,称赞他是“众望所归”。

尽管我不是余老师的好学生,但这并不妨碍我写余老师。我一直在想,余老师对于我,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我以为,余老师就是一个复旦传奇——1949年进复旦,既当行政领导、又做业务骨干,既管理过事务,又主持过学校层面的工作,而且著作等身、享誉业界,年届九旬还笔耕不辍。

我以为,余老师还是一个道德标杆——温厚、平和,为人谦逊,从不以势压人。与他交往,有如沐春风之感。这一点,我深有体会。例如,近几年来,我写过不少校史作文,一直觉得,这样的东西,拿不出手,所以从不敢给他看,怕他说我不务正业……哪里想到,每次遇到余老师,他总是夸我,说我校史写得好——我也不知道,他究竟从哪里得到了

我的信息。

那天,在《余子道文集》新书发布会上,余老师一见到我就说:“你的校史文章写得别开生面,非常好!”他的仁慈和宽厚,几乎要融化了我的心。临别时,他又亲切地对我说:“向你太太问好!你住在凉城新村的时候,我曾经来过你家。那时,你的女儿还这么小……”他用手比画了一下。

余老师的记性真好!上世纪90年代,我住在凉城新村复旦宿舍,余老师为主编一部现代史辞典,邀我参与。记得那年盛夏,他曾几次来到我住的小屋。小屋在四楼,没有电梯,余老师每次走上四楼,总是汗流浹背……

这些年来,余老师给我留下的这些美好印象,一直温暖着我。

3

为人低调,威望极高

余老师之所以精力旺盛、意志不懈,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。

1931年8月,余老师出生于浙江余姚。1949年春,正值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。其时,未满18岁的余老师离开就读的杭州新群高中,到诸暨枫桥参加浙东人民解放军,后随部队进驻宁波参加接管,成为军管会公安部工作人员。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是他后来研究军事史的动因,也是他心中火种不灭、热情不减的能量来源。

1949年10月,余老师考进复旦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入读复旦的本科生。他先读国际贸易系,后在国文课老师陈子展先生的鼓励下,转读新闻系。1952年8月,因国家需要,新闻系三年级学生与四年级同学一同毕业,大部分同学去了北京新华社总社,余老师是留校的三人之一,被安排在“新民主主义论”教研室任教。一个月后,他就与其他五名年轻助教走上讲台,讲授“新民主主义论”课程。按照复旦传统,助教是不能独立上课的。所以,当年六大助教上台讲课,成为校园里的一件大事。1953年,余老师被选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,学习中国革命史,主讲教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大家何干之先生,还有李新和彭明等先生。研究班结业后,他回到复旦,即调入历史系,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。

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日里,余老师在校、系各部门负责过党政工作,曾担任过历史系总支书记,也当过校党委宣传部的负责人。同时,在学术研究领域,他也做过艰难探索,是典型的“双肩挑”干部。那时,“双肩挑”的压力很大,没有充沛的热情和毅力,根本难以胜任。

据原校党委书记程天权老师回忆,他在“文革”前考入复旦后,余老师是一位他能接触到的“双肩挑”干部。“他谦虚和蔼,平易近人,又对课程和政治抱着饱满、炽烈的热情,学生常能受到感染。”有一次,余老师到程天权他们寝室,聊了一晚上的毛泽东军事思想,毫不疲倦。他对史实如数家珍、娓娓道来,让大家听得入神,都不舍得他离开。待他一走,有人问:“他是谁呀?”程天权老师答:“他就是余子道书记。”

余老师不仅让学生们由衷钦佩,同事们也对他赞不绝口。前不久,我遇见了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老师,他是这样评价余老师的:“余子道先生是我邻居,比我大五岁,笔头健、身体健康、记忆力超强。像他这样的人,现在已很少了!”吴中杰老师写过《复旦往事》等校史著作,是公认的复旦校史见证者、写作者。但是,说起余老师,他还是无限感慨:“余先生才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历史的完整参与者、亲历者……接下来,才轮得上我们。”

2

火种不灭,热情不减

2025年5月27日,是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纪念日。这天上午,学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。大会开始前,主持人一一介绍了与会嘉宾。当介绍到一位年迈的长者时,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。这位长者身穿烟灰色西装,系着红领带,在弟子金光耀教授的搀扶下,他缓缓起身,向大家招手致意……他,就是94岁高龄的余子道老师。

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余子道文集》为三卷本,煌皇150万字。其中收录的文章,最早一篇写于1956年,最晚一篇写于2021年,时间跨度长达65年。如果加上他写于2024年12月的后记,则跨越了68年——这一年,余老师已93岁!

笔耕不辍,亲力亲为

这里,我要特别强调的是,余老师出文集,可不是“只挂名不编辑”的“主编”。作为主编,他对该书的每一页,都看得认真仔细;对关键章节和词句,他总是字斟句酌、反复推敲,提出真知灼见。记得去年4月,余老师应邀出席历史系1980级学生返校活动,本来说好是由我负责驾车接送的。后来活动结束后,我要送余老师返程,国防大学教授张云老师对我说,由他来负责将余老师送回家:“因为我们还要去余老师家里,跟他详细讨论《上海抗日战争史》书稿呢!”

可见,余老师这位主编,是真的“亲力亲为”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是不甘寂寞、“赤膊上阵”——这对于一位九旬老人来说,是多么难能可贵啊!



扫码看视频